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断奋斗的壮丽画卷。在这 109 年进程中，发生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人们也许会问：五四运动前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 1915 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 1921 年，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呢？

其实，只要把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爱国救亡：五四运动的出发点

五四运动决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够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爱国救亡怒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说到底，人们被那时祖国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对创造合理的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是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动力。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几千年内绵延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威胁下，中国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翻开 20 世纪历史的第一页，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幅更加惊心动魄的图景：西方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

中国真的要灭亡了吗？昔日的辉煌同任人宰割的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这种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无法忍受。“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喊出来的。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

但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独霸东亚的野心，开始对中国进行规模空前而野蛮的侵略掠夺。他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 1919 年 1 月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原先期望能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去的特权归还中国，而巴黎和会却不容讨论地把这些特权又交给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

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原来抱着很高热情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至此全部化为泡影。过高的期望，使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

愤怒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1919 年 5 月 3 日，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 13 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在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山东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齐整洪亮的合唱，吸引了路人目光。这 50 多个胸前别着团徽的年轻人，来自广东惠州青年自发组织的户外运动社团——惠州市登山运动协会。

团十六大之后，团中央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对共青团提出的“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力争使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团首先着重部署了加强基层组织和组织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当作共青团的“活力工程”、“生命力工程”。

新时期，各类青年自组织不断涌现，惠州市探索基层团建新载体、新途径，依托当地登山协会建立基层团委，实现团组织与青年自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个吸引青年、凝聚青年的典型和全国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侧影。

“协会建立团委后，感觉团组织和我们青年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飘扬在每个人心中的团旗，让大家更加积极向上，争取进步。”在中国人民银行惠州市中心支行工作的温国彬，说出了成员们的心声。

惠州市登山协会团委于 2008 年 7 月挂牌成立。在共青团惠州市委书记韩维斌看来，在青年自组织中建立团组织，可以扩大团的影响力和亲和力。“登山运动协会拥有注册会员 197 名，准会员 800 名，我们将其作为青年自组织团建突破口。”

登山协会团委的形式，让松散的“社会人”重新成为“组织人”或“受组织影响的人”。曾是自由音乐人的张威说：“加入协会，成为团干部，让我更关心国家大事，更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更体会到共青团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成立团委不仅使团组织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也使登山协会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指导，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登山协会会长王金将之戏称为“背靠大树好乘凉”。

今年 2 月 14 日，登山协会搞了个青春联谊会。通过团市委帮助，短短 3 天组织了 600 多人参加。惠州交通、公安等部门也给予无私协助，活动大获成功。

协会团委书记陈国强表示，自协会团委成立以来，协会的活动“更加有组织有纪律了，也更加规范有序了”。“我们还有一个新任务，就是继续发展新团员，那些有志于加入团组织的，我们都支持他进步。”陈国强说。

《我的梦》走进澳门

本报澳门 5 月 3 日电（记者傅旭）5 月 1 日下午，由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体育发展局承办、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我的梦》大型体育艺术综合汇演，在澳门塔石体育馆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等为演出剪彩，并观看演出。

这次在澳演出原定一场，信息发布 4 小时后，门票即被一抢而空，不得不加演一场。4 月 30 日的晚场原本是彩排，变成了带观众的正式演出。精彩节目赢得数千名澳门观众阵阵掌声。

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使人痛苦，也催人奋进。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起步的。

群众运动暴风雨的洗礼

五四运动一发生，人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席卷全国、有着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的声势宏伟的群众运动。这在中国民族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过去，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行动，可是他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和只在部分地区进行的爱国活动。而支配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强大实力。如果只靠少数人而没有广大民众奋起投入，这种力量自然异常单薄，远不足以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以往近代历次革命以至改革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5 月 4 日那天，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过。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 月 7 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 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团体停业一天，各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 月 3 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宣布罢工。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纷起响应，其中特别激烈的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处在低潮。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嚣“武力统一”。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来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大风暴来。

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道：“从人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寂寞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

（上接第一版）“5·12”特大地震，四川省的重灾区面积即达 10 万平方公里，需重建的永久性住房达 126.3 万户，需维修加固的农房 221.3 万户。灾难突降后，四川全省人民在中央和全国人民

的巨大支援下，仅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上千万受灾群众过渡住房安置问题。然而，要让失去家园的群众尽早搬入永久性住房、过上安居乐业的正常生活，这又是多么沉重而迫切的任务！

去年 5 月 30 日，四川省召开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对灾后重建规划工作进行全面研究部署，明确提出在重建中坚持科学规划和选址、坚持社会公开公众参与、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确保农房抗震和施工质量等刚性要求，确立了“明确重建责任、明确重建时限、严格落实政策、统筹协调推进、破解资金难题、强化要素保障”等规划。

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四川地震重灾区 39 个需要编制或修编规划的县、市、区规划已经全部完成，702 个乡镇规划已编制完成 90%，2197 个村庄规划已编制完成 93%，汶川、北川、绵竹、都江堰、茂县等多个重灾城镇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已经正式批复实施。

为及时向灾后农民重建房屋提供技术保障，确保房屋质量安全，四川省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重建，鼓励有资格的建筑师、结构师、监理工程师以个人名义参与农房重建技术指导工作。德阳市组织技术专家到全市各区县巡回办培训班，免费培训农房建管人员和农村建筑工匠达 3000 多人。成都、绵阳、雅安、广元、乐山、眉山等市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管理，逐步建立起农村建筑工匠资格认证制度。据统计，仅全省建设部、团组组织技术人员下乡服务达 70 多万户，培训农村建筑工匠近 5 万人。

在各方面努力下，截至 4 月中旬，全省灾区永久性农房重建已开工 123 万多户，占重建任务量的 97.5%，已竣工的达到 95 万多户，占重建的 75.6%，220 多万套需维修加固的农房已全部完成。在 4 月初召开的全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刘奇葆说：“农村住房重建今年 9 月底要基本完成，年底要全部完成，要尽快让灾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注重特色改善面貌，让群众舒心

在距离老北川县城不远处的一处山谷坝子中，一大片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羌族建筑掩映在夕阳余晖中，这里就是在地震中曾成为废墟的北川县擂鼓镇猫儿石村吉娜羌寨。如今，这里山川依旧、溪水长流，美丽整洁的美式吊脚楼前，“羌”字彩旗迎风招展。

猫儿石村村支书张安清告诉记者，吉娜羌寨在重建前，规划部门反复论证征求意见，设计图纸全村人都仔细看过，各级政府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民意，按照老百姓的要求，连同改水改厨改厕改圈等新农村建设措施，一起写入新村规划，整个羌寨设计就是依山就势、层层叠叠，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此外，为增加羌寨的历史感，连村里的照明、污水处理、便捷通道、绿化美化、挡墙河堤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划。到去年底，69 幢新居完成建设，村民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家。村民们说，住这样的新房子里，感觉就像回到了老房子，亲切、踏实、舒心！

如何在农房重建规划中既符合科学、安全、方便要求，又体现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色和生活习惯，同时又利用重建机遇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成为建设规划部门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记者在青川县了解到，当地在为 5 万多户农民规划重建永久性住房过程中，把重建作为一次改善农村面貌、提升人居环境的重大机遇，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把“安全、经济、实用、节地、特色”作为农房建设的基本要求。记者走进几个已经基本完成重建的村落，只见“灰瓦房、白粉墙、木兰花窗”式的农家小院里，重新栽植的花草已经绽放出鲜艳的枝叶

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金冲及

重大的痛苦激励。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还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真正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所在。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动力。”“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还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写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东西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

和花瓣。

地处青藏高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这次地震的震中所在地，全州需要重建和维护的农房达到 13 万间。该州受灾最重的震中映秀镇在恢复重建中，规划部门以 8 度抗震标准设防，在房屋建筑上实行“双保险”，即“上部不减弱，底部要加强”。与此同时，规划部门还针对这里各民族融和聚居的特点，把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要素融入重建中，结合山水环境营造宜人的城镇居住、生活风格，把民居分成三类进行建设，包括以川西风格和羌族风貌为主的滨水居住片区、以川西风格为主的滨水商住片区和以羌、藏风格为主的山体居住片。目前，总投入约 20 亿元的映秀镇重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截至 4 月 24 日，阿坝州农房重建累计开工达 6 万多户、累计竣工近 4 万户，分别占需重建总量的 97%和 63%，今年国庆前受灾农户即可全部搬进新居。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让群众放心

据四川省国土管理部门统计，在“5·12”特大地震中，全省近 16 万农民失去宅基地，完全损毁的耕地总面积达 5.6 万多亩。让这些完全失去宅基地、丧失耕地或者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不仅要住上新房子，而且还能住得下去、生存下去，这是四川省农房重建中一个必须要跨过的门槛。

为此，四川省有关部门和各个灾区一方面积极为失去宅基地和耕地的农民调剂生产生活用地，一方面千方百计为灾区群众的生计筹划长远。

在都江堰市的蒲阳镇花溪村，村民蹇锡萍一家有座三排平房和一座二层小楼围成的川西风格农家小院。蹇锡萍告诉记者，在重建中她家获得了政府的 1.6 万元补助金，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再向银行贷了 3 万元，总共花了 6 万多元就把小院子重新修好建好。虽说欠了债，但蹇锡萍依然乐观。她指着对面一块占地近百亩正在建设的生态蔬菜大棚基地说，蔬菜基地占了她的家地，要请他们一家当工人，一旦到蔬菜大棚基地上班，她的家收入就能翻倍，银行的贷款也容易还了。蒲阳镇党委书记杨德伟说，全镇灾后住房重建就要拉动近 4 亿元的内需，镇上的川苏产业园区内还有食品饮料、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建材、新材料等数十家企业，不少居民就在本地上班。全镇大量农民现在已经转变成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目前镇上已有两个占地 1000 多亩的“折耳根”种植基地、3000 多亩药材种植基地、7000 亩笋用竹和 2000 亩猕猴桃种植基地。“这些农业产业项目已使得全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提高了大约 1000 元”。

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刘俊林告诉记者，都江堰按照“四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思路，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融入灾后重建，让灾区群众不仅能住上漂亮的新房子，更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广元市市委书记罗强告诉记者：“只有新房子，没有新产业，不是新农村。为此，广元市在农村永久性住房重建中，大力发展畜牧、林业、果蔬三大优势产业和猕猴桃、木耳、核桃、烟叶、茶叶、油橄榄等特色产品，并有序组织灾区农村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参与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工程。虽遭了大灾，但去年全市创下了大灾之年‘粮食不减产、农民保增收’的好成绩，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4.7%，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实现了‘开门红’。”

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增收能力，是四川省各地在推进农村永久性住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农业厅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全省围绕灾区群众增收的农业生产项目投入大幅增加，农村经济呈现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扩大内需新增农林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7 亿元，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达 610 亿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1350 元左右，同比增长 10%。

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1920 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 5 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1 年，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 30 多年的奋斗，一步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本报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白龙）“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日前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深化司法能力建设等 6 项措施，全面提高队伍素质。这是记者近日从在京召开的全国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这 6 项措施包括：深化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三个至上”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的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党性教育；深化司法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干部培训工作、岗位练兵、法官下基层活动，以及不同岗位和不同层级的交流；深化司法作风建设，大力培养法官的为民意识、务实作风和创新精神；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不懈地抓教育、抓监督、抓查处；深化法院文化建设，准确理解法院文化建设的内涵、坚持正确的法院文化导向，把法院文化建设与创建“学习型、团结型、创新型”机关紧密结合起来，深化制度建设，要在完善人员分类管理机制、完善业绩考评制度、落实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队伍管理体制上取得新突破。

江西实施“光明·微笑工程”造福 21 万名患者

本报南昌 5 月 3 日电（记者刘建林）日前，江西启动“光明·微笑工程”，计划用 2 年时间，为 20 万例视力低于 0.1 的白内障患者和 1.2 万例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专项救治。

为了把这一深受群众欢迎的惠民工程做实做好，全省指定了 94 所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组织医疗服务小组深入乡村、社区开展患者筛查、登记，并运送患者到定点医院手术，做好术后回访。江西筹集资金近 3 亿元，按白内障手术每例 1200 元、唇腭裂手术每例 4900 元的标准补助定点医院，确保患者不花一分钱。

南昌市在全省率先启动“光明·微笑工程”，对全市 2.78 万名白内障和 7600 名唇腭裂患者进行免费修复治疗。全市 4 所市、县定点医院制定了治疗方案和技术标准，截至 4 月 27 日，全市共实行白内障手术 113 例，成功率 100%。

湖南桃江“民情日记”解民忧

本报桃江 5 月 3 日电（黄梦其，罗中华）湖南省桃江县日前开展“建设民本桃江”实践活动，2000 余名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农户家庭 2 万多个，召开大小座谈会 800 多场次，撰写民情日记 2 万余篇，切实解决群众困难 600 多件。

桃江县委书记黄进良在最新的一篇民情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该县灰山港镇连河村 800 多名村民因水质损坏而存在饮水难的问题。桃江县每名干部都有自己的“民情日记本”。

“干部至少要走访联系村 1/3 的农户家庭，慰问 10 户以上的困难户，组织填写 30 份调查问卷，写好民情日记，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桃江县在活动开展之初对深入全县 284 个村子的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县科技局的干部与武潭镇的新铺子、延津桥、杨家坪、熊家村本来就是对口扶持的关系户，这一次索性自带活动经费与伙食费扎根在镇上，与农户同吃同住，传授他们急需的科学种养技术。通过与农户举行座谈会，他们摸清了农户的切实困难，并将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困难都写在了自己的“民情日记本”上。